

司馬池訓子

陸琴華



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作爲一家之主，平時非常注重對司馬光的習慣養成教育。比如司馬光六歲時，司馬池就教他讀書識字，到了司馬光七歲時，司馬光不僅能全文背誦《左氏春秋》，還能把這部書的要文大意一說出來，其聰明伶俐和過人的記憶力討人喜愛。衆所周知「砸缸救友」就是讚揚童年司馬光急中生智的故事。而且，司馬池在對司馬光進行智育投資的時候，也不忘對司馬光進行品德教育。

司馬光五六歲的時候，一次在院子裏採摘核桃。那些被他才採摘下來的核桃硬巴巴，結實得跟石頭蛋子似的。司馬光用小手掰，核桃紋絲不動；塞在嘴裏用牙齒咬，似乎也沒有用。面對着一個個圓滾滾的核桃，小小的司馬光無所適從。姐姐見此情景，走過來替司馬光解決核桃去殼的問題，結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那些核桃還是原封不動。無奈，姐姐只得丟下核桃，滿臉沮喪的離開了。這時，司馬光急了，真想用錘子把那些攤在地上的核桃砸碎。可是這樣做往往又會把裏面的果實弄碎，影響觀感不說，還影響了口感。正在司馬光無計可施之時，家裏的一個婢女過來，對司馬光獻計：「我來試試。」就把那些核桃拾起來，放到有開水的鍋裏。經開水煮沸，那些核桃殼子都很容易地剝了下來。司馬光感到意外，也很激動和興奮

，捧着那些沒了殼子的核桃又蹦又跳，歡喜得不得了。這時姐姐又來到司馬光面前，見到先前的核桃殼子都沒了，一臉的驚訝和疑惑，問司馬光：「那些殼子是怎麼剝下來的呢？」司馬光一聽姐姐詢問，還沉浸在先前的激動和興奮之中，脫口而出：「那些殼子是自己掉下來的呀。」麥熟三晌，瓜熟蒂落，那時司馬光想用這個常識騙騙姐姐一時的無知，姐姐也信以爲真。司馬光暗自得意自己的小聰明。誰知司馬光說的謊話恰恰被經過這兒的父親司馬池聽見了。

說真的，司馬光自幼聰明伶俐，悟性很強，深得父親司馬池歡心和喜愛，每逢出遊和同僚密友交談，司馬池都把司馬光帶在身邊以示威耀。可是當他聽到司馬光撒謊時，過去的歡心和喜愛頓時煙消雲散，一臉愠怒，訓斥司馬光：「小子何得謾語？」謾語就是撒謊欺騙，說假話。「誠實比一切智謀更好，而且它是智謀的基本條件。」司馬池深知誠實本分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，訓斥就是要小小年紀的司馬光吸取教訓，認識到撒謊欺騙的危害性。爲了達到引以爲戒的目的，司馬池還讓小小年紀的司馬光親自到那個婢女面前承認錯誤，肯定了那個婢女的見多識廣。

「孔子家兒不知罵，曾子家兒不知怒，所以然者，生而善教也。」這是明代蘇士潛《蘇氏家語》的一段話。司馬池的嚴厲，爲成年後的司馬光參與編纂《資治通鑑》奠定了嚴謹求實一絲不苟的思想基礎。

回憶鄉村

徐貽聰



前幾天寫過一則短文，其中提到我出生在離大運河蘇北段不遠的地方。此後，我經常會想到家鄉，想到我小的時候，有時還出現在夢中。

我的出生地叫三岔，部分人家的房子就建在運河大堤上，地圖上找不到，是個很小的地方，在我的那個縣，如今叫「區」，則處在邊遠地帶，因而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何處。家鄉地處平原，連個土丘都沒有。在我的家門前有個自己挖掘出的水塘，鄰近的五、六戶人家從那個水塘裏取水洗菜、做飯、洗衣和飼養家畜禽。小的時候，因爲擔心我出意外，大人嚴格禁止我接近水塘的水面。我在那裏生活、上學到十二歲，除去期間因兩次戰爭外逃過總計約三年外，我一直居住在那裏。養活和照顧我的，是我的祖父母和我的叔叔嬸嬸，因爲我的父母在外面打仗和在縣城裏工作。在那裏，除去上學，我也參加農活。我學過犁地、耙田、播種、收穫；每天要割草，餵養豬牛；天還不亮就到四野去尋找人和動物的糞便（我們那裏叫「拾糞」），以作莊稼的肥料。於我而言，夏季在玉米和高粱地裏打葉子是個非常苦的差事，因爲要頭頂烈日，又要長時間在密不透風的玉米和高粱桿擋住僅有微風的田壟裏，感覺真的比現在的「蒸桑拿」還要熱，還要難以透氣。玉米和高粱葉子會時時地把胳膊割出一個個血道，在汗水作用下讓人疼痛難忍。

蘇北是低窪地帶，有雨就會滂，雨少則會旱，所以災難不斷。我在農村的那些年，家鄉屬於雜糧區，以小麥、玉米、高粱、花生、棉花和各種豆類爲主，人們不知道種植水稻，收穫很難維持一年的生計。我現在看到白薯就害怕，我的孩子們批評我「忘本」，是因爲我在農村那些年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要靠白薯爲基本食品，從白薯葉、嫩白薯，到白薯乾和白薯麵，在大約半年的時間裏的每日三餐，頓頓飯都與白薯有關，極少有其他糧食。儘管如此，爲了果腹，硬着頭皮也得吃，故而讓我對白薯產生「恐

懼感」。記憶中還有另一種難忘的飯食是無鹽和油的白水煮蘿蔔，因爲它實在難以下嚥。買不起油和鹽，大部分食品本質上都是「原味」，那種日子確實很艱難，讓人無法忘懷。

我記得，一年中最爲高興的時候是過春節那幾天。在老家，鄰里鄉親有過春節合夥宰豬的習慣，就是幾家甚至幾十家人聚在一起，共同宰殺一頭自己飼養的豬，按計劃在參與者之間進行分配。大人們忙着抓豬、屠宰、吹氣、褪毛和分割，孩子們則裏外歡樂地奔跑、嬉鬧。豬的嘶叫聲和孩子們的歡呼聲混雜在一起，場面熱鬧、火爆，有點動人心弦。奇怪的是我小的時候，不知道什麼原因，不喜愛吃肉，因此我的祖父母和叔叔一定會向宰殺豬的主人討要我愛吃的內臟，爲我烹製並特別收藏。此景此情，至今仍讓我唏噓不已。

讓我仍然依稀記得的還有除夕夜的祭神和大年初一的拜年，簡單、隆重的傳統禮儀顯示的鄉村文明和農民的質樸。午夜時分，全家人會在一家之主的帶領下，排列在紅燭映照下的「堂屋」裏，默默地在祖先的牌位前擺上能有的食品、果類和酒，燃上多爲紅色的線香，然後跪下磕頭，祈求上天和祖先們保佑平安和豐收。雖然夜深，但小孩子們也都精神抖擻，按捺不住興奮。年初一那天，一般都在中午以前，近親和近鄰會相互拜年，多是在每家的牌位前磕頭，嘴裏不斷地念叨着叩拜對象的稱謂，情景真誠、感人。

在我十二歲那年，我轉移到了父母工作的縣城，離開了鄉村，也開始遠離鄉村的文明和習俗。不需要幹農活，沒有了農村的過年傳統和艱苦的歲月。真的說不上，是進步，抑或是丟失？或許，是與時俱進，或者是時過境遷吧？總之，留給我的是許多無法忘懷的過去。

人都說，人越老越容易回憶過去，特別是童年的往事，儘管許多事情只在朦朧之間。我的這些回憶和思念也應該屬於此列嗎？我想，是的，我不是剛剛被人連續慶祝過耄耋之壽！思念過去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不僅如此，肯定還會不斷地、長時間地憶舊，甚至攪動真情。

粵劇名伶與戲服師傅

林也



廣東人稱粵劇爲「大戲」，「睇大戲」就是看粵劇。粵劇戲服很講究，俗稱「大戲服」。

大戲服行業是很高的工藝，戲服大師傅絕對稱得上專業人才，今時從事行業的人爲數可數，仍然從事戲服的老師傅陳國源擔心後繼無人。

戲服是總稱，細分三個行頭，頭飾是一個行頭，國帶俗稱腰帶是一個行頭，戲服又是主要行頭。就算是行內人，全能師傅亦甚少，做頭飾的未必會做戲服，陳國源師傅是少有的全才。

大戲的行當有小生、花旦、武生、丑生，不同身份，穿不同的服裝，不同的帽子，頭飾有別，都是非常講究，大戲中的聲色藝，其中的色，包括扮相，扮相與角色配合，角色與服裝配合，否則衣不稱身。從事戲服這個行頭，要熟悉傳統，老生的戲服比較深色，將帥戲服可用龍形刺繡，其他用獅子、老虎或雄鷹，小

生、花旦用「花組」，如梅蘭菊竹。二戰至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戲服花紋用人手刺繡，到六十年代，開始採用衣車繡。大老倌各有要求，老行專說，林家聲對自己的戲服要求很高，圖案刺繡須特別細緻，十天可以完工的，他要十五天，承接他戲服的師傅不敢馬虎。

如今八十歲的陳國源老師傅，是粵劇戲服的「活字典」，熟悉戲服配搭每處細節，他十八歲入戲班，正遇粵劇興盛，他由學戲轉爲做戲服，過程有趣。

有一次與任劍輝同場做神功戲，其中一場戲講任劍輝陣受傷，由一個兵仔扶傷，臨時缺一兵仔，叫他出場，前後幾分鐘，第一次踏上戲台，即與任姐同台演出，令他畢生難忘。這場戲之後不久，他突然決定放棄學戲，跟師傅學做大戲服，一做就六十年，反而成爲粵劇戲服行業的大紅人。

陳師傅回憶初入行時，學做頭飾，熟能生巧，一直堅持用純手工製作。他最得意的事，首創「文武髻」活動頭飾。他解釋說，原來的大戲頭飾，一款只有一個角色，第二個角色要

刈麥拾穗圖

李夢



古人說：「春耕，夏耘，秋收，冬藏，四者不失時。」舊時候的民衆，尤其是鄉裏農人，異常看重時令節氣，幾時收麥幾時播種幾時休養生息，須要記在心上，才不至於違背了自然榮枯消長的規律。

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在《觀刈麥》中，寫過一句「婦姑荷簞食，童稚攜壺漿」。寥寥幾個字便將那麥收時分田間鬧上熱鬧的、其樂融融的景象呈現出來。近來，我看歐洲百多年前的油畫，竟也見到若干關於秋收刈麥的作品，畫幅中也不乏一家大細奔忙鬧嚷的生趣。

活躍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英國畫家艾格里（William Maw Egley, 1826-1916）曾創作過一幅名爲《諾福克秋收景象》的畫作。畫幅遠景處有極開闊的平原和異常平坦的天際線；中景有樹叢以及被樹叢遮掩的古堡；衆人則位於畫幅前景，三兩成羣。右側是鄉民，男人們完成割麥收麥的任務，約上妻子或姐妹跳起圓圈舞來，老人和小孩在一旁，或坐或躺地看熱鬧，神態俱是輕鬆愉悅。左側一群人的衣着裝扮顯然更考究些，頭戴禮帽的男人牽馬，女人則身着華麗斗篷，看樣子像是貴族人家的小姐先生偶然路過此處，見此熱鬧情景，忍不住停下來一探究竟。

艾格里的這幅畫作中，並未直白描摹鄉

民農人收割刈麥的模樣，而是單單捕捉麥收後的歡愉場景，這不禁讓人想到意大利畫家羅薩諾（Federico Rossano, 1835-1912）那幅同樣關乎田間秋日景象的油畫作品。羅薩諾畫中也有草垛，有麥田，有闊遠的天際線，不過在構圖和設色上，較之《諾福克秋收景象》顯然更勝一籌。

與艾格里略顯笨拙的構圖和過於鮮艷甚至甜膩的畫作對照來看，羅薩諾筆下的秋收風景溫煦、恬淡，畫幅正中偏左的農婦與小女孩牽手前行。女孩仰頭、農婦俯身，兩人之間的互動，又爲這平靜的畫面添多一些親昵與愜意。

記得白居易那首《觀刈麥》中，除去荷鋤攜壺漿的熱鬧之外，還分出筆墨，寫了詩人身旁的一位貧婦人。婦人失了田產與家業，懷抱幼兒，只得撿些麥穗果腹充飢。一邊是麥收的喧騰景象，另一邊是形單影隻的流離難民，詩人將這明暗兩重光景寫入同一首詩中，或也見出他對於無常世事的感慨與悲憫。

既然說到「悲憫」，便不得不提到米勒（Jean-François Millet, 1814-1875）的畫作《拾穗者》。

白居易詩中的婦人衣食無着，拾穗充飢，而時常出現在法國人米勒畫中的主角，同樣是一群窮困的農婦。

與其他巴比松畫派的畫家一樣，米勒因爲厭倦了繁華都市的虛偽與奢靡，曾在巴黎近郊一條名爲巴比松的村子裏，住了很長時

間。那段鄉間生活不單幫助畫家清靜身心，也爲他的藝術創作提供諸多滋養。《拾穗者》一畫，便是創作於一八五七年他在巴比松定居期間。

米勒雖說創作了衆多鄉間場景的畫作，卻對「拾穗」這一主題情有獨鍾。《聖經》中有一個故事，講的是一位名叫路得的女子在路邊撿拾麥穗，供養自己的婆婆拿俄米。因此，拾穗這一動作本身，在後世人眼中，也便多了些溫情的意味。《拾穗者》這幅畫，也是一副溫情脈脈的樣子：黃昏，天色漸暗，馬車載着農人一天的收成遠去時，三位貧苦婦人在割麥後的荒原上，撿拾那些被遺忘的碎穀粒，回去給家人熬一鍋稀粥。畫中三女子，兩位彎腰，另一位半直着身子。觀衆看不清她們的面孔，卻能想像出她們憂鬱悵惘的神情。

米勒在描畫這些窮婦人的時候，並沒有用刻意煽情或戲劇化的筆法，也無意突出她們生活的悲苦與潦倒。畫中人的衣飾雖樸素，卻並不邋邋寒酸；她們雖說爲生計所迫，卻不曾惶恐或絕望，仍以專注且細緻的姿態尋找食物，同時也在尋找生存下來的可能。米勒身爲寫實主義畫家，對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，自然有他的不滿以及憤怒。但他的指責並不是直白宣泄的，而是藉由這樣樸實可敬的農人形象，間接傳遞出來。那些日落時分的拾穗者，那些困窘中仍保持體面與尊嚴的農人，分明是畫家在暗示人與土地的永久牽連。

觀點。愛因斯坦去世之後，波爾經常緬懷這位作爲對手的老朋友，每當他又有新見解時總會想，對此不曉得愛因斯坦會有什麼看法。有一張波爾的照片發人深思——其背景是一塊黑板，黑板上的粉筆字全是愛因斯坦的手跡。

梁漱溟和毛澤東是同齡人，自抗戰時期起，兩人便成爲能對話的朋友。一九五三年，兩人因政見不合分道揚鑣，此後梁漱溟吃過不少苦頭，包括「文革」中被抄家、挨批鬥等。毛澤東故去後，梁漱溟對他有如此回憶：「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，講話不分場合，使他（指毛澤東）很爲難，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，這是我的不對。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，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，這些都是難免的，可以理解的，沒有什麼。那件事後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，生活待遇照舊，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，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。他已故世了，我感到深深的寂寞……」



艾格里的《諾福克秋收景象》 作者供圖



米勒畫作《拾穗者》 作者供圖

緬懷爭吵

言止善



爭吵有什麼可緬懷的？且聽我慢慢道來。

和老伴一起看電視，記者採訪北京老人院裏的一對夫妻。退休前，男人是音樂學院的教授，女人是國家一級演員。老太太在鋼琴上彈完一曲《梁祝》，一聽，就知道她是個下過功夫的人。老先生問：「這是什麼曲子？」老太太不答。老先生進一步提示：「梁山伯與……」老太太始終答不出「祝英台」三個字。木然的老太太真讓人心疼，我想，這時如果兩位老者之間能爆發一場爭吵，該多麼激動人心。

老伴和我都是老年人，對這一幕有相同的感想——過去我們總認爲爭吵不好，其實不然。幾十年間，我倆少有爭吵，遇到問題習慣於冷靜處理，但若真有那麼一天，阿爾莫海茨病來襲，某一個痴痴呆呆，稍微清醒的一個一定

會想，往日的那些嘮叨，那些抱怨，那些你爭我吵該是多麼值得緬懷的珍品。

我們一起回憶了一位心理專家的開導，她勸世間的夫妻不要害怕爭吵、迴避爭吵，因爲爭吵往往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，夫妻要吵，就該吵出個高水準來。她提醒雙方要把握三個要點：一是要把自己的感受講清楚，二是要讓對方把話說完，三是不要揭老底翻舊帳。

有言道，夫妻是前世的冤家，這可不是信口開河的妄語。又有言道，夫妻的最高境界是成爲朋友，這話也有道理。如果兩個人相處幾十年，卻從來不爭吵，他們能成爲朋友麼？

愛因斯坦和波爾都是頂級的物理學家，在量子物理的發展史上兩位都功不可沒，他們先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。但在對量子力學的解釋上兩人卻各執一詞，前後論戰了三十年。以波爾爲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是主流派，愛因斯坦屬少數派。但後者至死也沒有放棄自己的

觀點。愛因斯坦去世之後，波爾經常緬懷這位作爲對手的老朋友，每當他又有新見解時總會想，對此不曉得愛因斯坦會有什麼看法。有一張波爾的照片發人深思——其背景是一塊黑板，黑板上的粉筆字全是愛因斯坦的手跡。

梁漱溟和毛澤東是同齡人，自抗戰時期起，兩人便成爲能對話的朋友。一九五三年，兩人因政見不合分道揚鑣，此後梁漱溟吃過不少苦頭，包括「文革」中被抄家、挨批鬥等。毛澤東故去後，梁漱溟對他有如此回憶：「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，講話不分場合，使他（指毛澤東）很爲難，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，這是我的不對。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，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，這些都是難免的，可以理解的，沒有什麼。那件事後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，生活待遇照舊，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，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。他已故世了，我感到深深的寂寞……」